

全球视野下的中日关系

汤重南

内容提要 至201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已经签订40周年。当下,面对两国关系的困境,如何建立东亚中日两强并立、和平互利的关系成为值得深思的重大问题。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下,回溯中日关系自古至今的历史:两千多年来占主流地位的是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史,当然也包括古代倭寇、三次战争和我国历史上的“锁国”和“海禁”,此外更有近代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1972至2012年的两国建交及之后的曲折历程。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评估、判断并思考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只有通过加强各层次的广泛、深入的友好交流,保持两国间高层不拘形式的接触,利用多边会谈会见促进双边关系等措施改善和稳定发展两国关系,才能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关键词 全球视野 中日关系 未来发展

至201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已经签订40周年。作为对这一重要历史节点的纪念,本文拟从历史、现状及未来三个时段对“全球视野下的中日关系”进行叙述,换言之,将从古至今的中日关系置于宏观视野,从世界的视角加以阐述。不仅铺陈基本史实,更欲作出评估、判断和思考。

迄今为止,深入研讨中日关系历史及现状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而探讨世界中的中日关系的专文,却不多见。文章肯定存在诸多不当及缺漏之处,诚望各位师友批评指教。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考察复交前的中日关系

从世界历史角度考察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前的中日关系,概括地说主要内容有三:一是从远古走来的民族起源、形成和融合史;二是古代(包括日本史的中世、近世)两千多年占主流地位的友好交往,特别是文化交流三次高潮的历史,还有古代倭寇、三次战争和“锁国”“海禁”史;三是近代日本侵华七

十年史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

(一) 古代(中世、近世)中日关系的世界历史地位

如果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观察,早在两千多年前,中日两国已开始交往,即有了两国间的关系。在近两千年间,日本从中国吸收、引进了大量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甚至中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制度、规章,亦被日本照搬、借用或参考、借鉴。

若从更久远的洪积世、旧石器、新石器时代考察,则可以发现两国间早有通交关系,大量的出土文物和遗迹等考古学、地质学成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是两国学术界的共识。就是日本民族的族源问题,亦有中国大陆的“江南说”“云南说”和“东北说”,而“日本人种中杂有中国人种血统”则是两国民族学、人类学学者基本一致的观点。就是说,在世界人类形成发展史上,在国家及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中日关系已经存在,并且应该有其科学的准确定位。既不能拔高,也不应

忽视。当然,这尚属于世界史的史前史阶段,科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尚未开始。

还是回到两千多年前,从古代中日关系谈起。秦汉时代的中国已发展到封建社会历史阶段,日本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社会后期和部落联盟的历史阶段,即“野蛮、蒙昧”阶段。中日间最初的交往是以日本多方面受到中国经济、文化影响而开展的,使日本发展成“东亚文化圈”“汉字文化圈”或“儒学文化圈”的重要一环,日本社会在从“野蛮”向“文明”飞跃时,中国是起了巨大作用的;日本国家在从落后逐渐发展到先进时,其受惠于中国是不争的事实。当然,国家间的直接交往十分重要,也不可忽视民间的往来交流,特别是通过东北亚的朝鲜半岛到日本去的大量中国移民所起的巨大作用。中国移民到日本后,所发挥的文化传播作用在隋唐时代前甚至超过正式的两国官方的直接交流,民间商人、僧侣在宋代至明代、清初时期的交流作用亦基本取代了两国官方的交流关系。

古代中日关系,除占主流地位的两国友好交往史外,还有过三次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中日间的战争。第一次是663年唐朝与日本在朝鲜白江口(今锦江口)进行的战争;第二次中日战争则称为“元军征日”,元朝忽必烈于1274年和1281年两次东侵日本,惨遭失败;第三次是丰臣秀吉于1592年和1597年两次侵朝,明朝政府两次出兵援朝。还有两百多年间中日基本断绝正式往来的时期,即日本江户幕府推行“锁国”和清朝政府实行“海禁”政策的时期;日本战国时期,即中国明朝中后期时的日本“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地区及中国抗倭斗争时期。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中国,确有其不可动摇且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而日本,在日本以外的与世界历史相关著作中,仅有关于大化改新、武士、德川幕府等极为简略的记述话语。古代、中世纪时期的日本,似乎在世人关注的视野之外,于世界史的意义确实不大。

但是,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却与日本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不尽相等。中国建立的朝贡册封体制中有日本,“中国文化圈”“儒学文化圈”和“汉字

文化圈”中也有日本,日本是当时东亚世界中的重要一员,有其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中日关系源远流长,文化交流中隋唐、宋代两次高潮在世界文明史、世界文化交流史中具有不容轻视的地位和作用。古代三次中日战争,因均与朝鲜半岛有密切关系,中国被卷入其中,因此就不仅是两国,实为东北亚地区间的冲突、战争。在古代中世纪时,开疆拓土、对外征战被视为封建帝王的功业伟绩,且当时中日战争的影响也局限于东北亚地区,故在世界历史中几乎查找不到对中日古代三次战争的具体记载。又因中日战争亦未涉及领土疆域变化,而只是战斗后即相互撤兵,故易被世界历史忽视。从这里,似乎显现出中日关系在古代中世纪时期,被载入世界历史的占主导地位的是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史部分,即中日文化交流史在古代中世纪世界历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一点值得我们记住并进行理性的思考。

(二) 近代时期中日关系的世界历史定位

长达千年不受世界历史关注的日本,在进入近代后,却如耀眼的彗星,划破沉沦中的世界东方的沉沉黑夜,在亚洲迅速崛起,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现代化。这一时期的日本,摆脱了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机,通过国内各项改革和对东亚弱小邻国的侵略、扩张和吞并,“脱亚”入欧,与西方欧美列强为伍,成为争霸亚洲和世界的重要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而作为老大的中国,在进入近代前已经腐朽没落,1840年被欧美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国门后,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很快亦受到日本侵略,备受欺凌。

这一时期的日本及中日关系,正式进入世界历史的视野,受到全球关注。我们知道,近代的国际社会是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有其民主化、法制化的一些正面作用,更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理论 and 行动。尤其是“以军立国”,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日本,不仅接受西方的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理论,而且将传统的“天皇中心主义”“皇国史观”及武士道与之杂糅,把军国主义发展到极端形式——日本法西斯主义。近代日本对中国进行了长达70年的侵略。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史,

主要是从 1874 年日本出兵侵我台湾至 1945 年间的七十年侵华史和中国人民反抗斗争史。当然,其间还有 1896 年开始的以中国人到日本留学热为中心的第四次中日文化交流高潮,达二十年之久。

对近代时期的中日关系,从世界视角考察,大体可从三个方面进行简要概述。

一是面对欧美列强的东侵,中日两国的应对及结果不同。

首先,两国在 19 世纪中期有着共同的历史命运。此时两国基本上均处于封建社会末期,面对西方列强的东侵,也有过一些抵抗,不过都以失败告终,被迫与欧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两国也共同面临着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运和危机。

这一时期,由于日本处于德川幕府末期的“锁国”状态,而清政府亦延续明政府推行的“海禁”政策,所以中日两国仅有长期维持的勘合、信牌交往和贸易,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直到明治维新后的 1871 年,两国始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及《中日通商章程》。但这一时期的条约基本上是平等条约,在世界上无甚地位和影响。在 1874 年日本侵我台湾和 1879 年日本吞并琉球过程中,特别是日本在 1876 年迫使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岛条约》前后,日本开始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对外实行扩张侵略,中日关系实际上开始向不对等的方向倾斜。

其次,两国关系从 1868 年明治维新后开始发生逆转。日本通过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推行开国和“失之西方,补偿于满鲜(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政策,在国内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指导方针,积极应对西方列强的东侵,加之有极为有利的国际条件,最终“脱亚”成功,避免了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运。而中国在这一时期,老大腐朽的封建清王朝面对新锐的西方列强,举措失误、应对无方,加之国内太平天国运动的严重冲击,虽有洋务运动和近代启蒙运动的开展,也无力回天,逐渐走上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

在这一时期,中日关系已开始发生较大逆转:无论在朝鲜问题还是在琉球问题上,日本均逐渐

占据上风,而中国已处处被动,应对乏术。在两国内政外交上,日本迅速发展崛起,中国日渐沉沦,中日关系凸现出巨大的、根本性的转折:中国在上任列强宰割,日本开始与西方为伍,而且更加疯狂和残忍地对付中国。中日关系在世界史中地位提升,却表现为日本开始与列强一起,掀起共同瓜分中国的狂潮。

二是日本发展成为列强的重要成员,并积极参与瓜分中国。

日本成为列强中对中国最为凶恶、为害中国最甚、妄图独占灭亡中国的东洋霸主。

首先是于 1894 年至 1895 年发动侵略中朝的甲午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该条约规定,日本割我台湾、澎湖,索我巨额赔款,迫我开放口岸,强夺我国利权,等等。以此为标志,在世界史上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接着是每五至十年日本军国主义都要对华进行武装侵略:1900 年派兵镇压义和团运动,与列强一起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长期在我国占地、驻军;接着于 1904 至 1905 年在中国东北与沙俄为争夺朝鲜和中国东北而进行日俄战争,通过“朴茨茅斯条约”,私相授受中国东北的各种权益;1914 年日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占我山东,1915 年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27 年三次出兵山东;1931 年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了 14 年侵华战争,更在 1937 年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进行全面侵华战争。这是日本羽毛渐丰、加倍疯狂侵略中国的时期,也是中国任日本侵略,不断丧失领土、权益的时期。这时的中日关系是日本侵华,中国备受欺凌。当然,也有中国政府不思进取、腐败无能,致使中国积贫积弱,面对列强束手待毙的问题。

其次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从 1896 年开始派遣留学生赴日学习,掀起第四次中日文化交流高潮。在 1904~1905 年日俄战争时,中国竟然宣布“局外中立”,还曾有过将日本战胜沙俄,误认为黄皮肤亚洲人战胜白皮肤欧洲人而倍觉兴奋之世界级别的怪现象。

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已具有世界历史的某种意义,即日本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殖民扩

张、掠夺,在世界殖民史中占有重要的一页。从全球视野看,日本迅速发展为列强中的一员,具有资本主义国家向外侵略扩张的共性;其个性则是走向了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道路。日本对中国,则狂妄到妄图像对琉球王国、朝鲜一样,完全侵占,彻底吞并。

三是1931~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时期,特别是从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开始了全民族抗战时期。正如毛泽东在1939年所指出的:日本已成为“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成为德日意法西斯轴心国重要成员,中国则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四大国之一。战后中国废除了一系列过去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亦成为战后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地位,是世界历史中的重要篇章。

这一阶段的中日关系,已完全具有世界意义,中日关系在世界历史中亦具有重要意义。

(三) 战后初期(1945~1972年)中日关系的世界地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宣告日本侵华战争结束,大日本帝国败亡,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彻底覆灭,也宣告中国在百多年来抗击侵略的斗争中首次取得了完全的最后胜利。中国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国中的重要成员,以胜利者的身份参与了同盟国于9月2日举行的日本签署投降书的仪式和对日本战犯的东京审判。这些均具有世界意义。

战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日本在被美国事实上单独占领后,进行了历史性的民主改革,特别是制订了“和平宪法”,保证了日本七十多年来的和平与发展。中国的变化更是翻天覆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以全新的形象登上世界舞台。

战后初期,世界的政治格局“雅尔塔体制”,

实质是美国(世界资本主义阵营的代表)和苏联(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代表)的“冷战体制”。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由于在冷战体制下分属两大不同阵营,官方正式关系长期处于断绝状态。美国从中作梗,中国未能参加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签订。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旧金山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②。《旧金山和约》条约签订后,日本得以重返国际社会;又由于《美日安保条约》的签订,日本成为美国东亚战略中的小伙伴。日本政府长期坚持敌视新中国的态度和实行反华政策,中日政府间无外交关系,中日邦交一直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中。

但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日本就建立了“日中友好协会筹备会”,到1949年底筹备会已达400多人。1950年5月协会正式成立。1952年参加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日本代表高良富、帆足计、宫腰喜助三位国会议员、原议员,到北京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订立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还有在侵华战争结束后滞留中国的三万多日本人,至1958年全部回到日本。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许多贡献,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编写的《友谊铸春秋》第一、二卷,对其中近百人的事迹作了记述。大量的民间团体、个人的交流活动就此频繁开展,两国人民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友好往来不间断地迅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两国官方外交。人民间的友好使者的作用和意义十分重要且巨大,“以民促官”、半官半民,成为发展中日关系极为宝贵的经验。这一经验,不仅在当时,就是在现在与未来,对处理世界国家间的关系亦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广泛的影响。

1972~2012年间世界视角下的中日关系

1972年9月,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距今已46年。

其中第一阶段是从1972年至1989年。

在这一时期,中日于1978年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今年适逢40周年。当年,邓小平副总理为参加交换条约批准书仪式访问了日本,揭开了中日人民间空前广泛规模宏大的交流以及政

府间往来空前频繁的历史大幕。两国首脑互访,都是在相隔半年左右进行,充分反映了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密切交流的迅速发展。

从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开始,互访状况简列如次:1979年12月,大平正芳首相访华;1980年5月,华国锋总理访日;1982年6月,赵紫阳总理访日,1982年9月,铃木善幸首相访华;1983年11月,胡耀邦总书记访日;1984年3月,竹下登首相访华;1985年4月,彭真委员长访日,1985年7月,日本木村睦男参议院议长访华;1986年11月,中曾根首相访华;1988年6月,日本原健三郎众议院议长访华;1988年8月,竹下登首相访华;1989年4月,李鹏总理访日。其间,还有1981年10月,福田纠夫前首相访华,等等。

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无论在中日两国,还是在东亚、亚洲和世界,都促进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积极影响。

第二阶段是从1990年至2000年。

在这一时期,雅尔塔体制和冷战国际格局结束,国际形势变化巨大,中日两国和两国关系亦发生了巨大变化,两国关系亦发生巨大的变化。

首先是中国1989年发生“六四”风波后,日本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起对中国进行了指责和制裁,但日本主张尽快恢复与中国的接触,迅速解除了日本国民来华的禁令,派出国会代表团访华。接着,恢复对华援助,1990年11月,日本解除了被冻结的对华第三次贷款。特别是1991年8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继日本外务、大藏和通产相访华后,作为“六四”风波后西方国家首位首脑访华,标志着中日关系全面恢复。日本这一时期处理中日关系的主张和行动,自然得到了中国的肯定和欢迎。

也正是在海部首相访华期间,日本提出了“世界中的中日关系”这一概念。当时,海部在北京中日青年中心发表题为“新的世界与日中关系”的讲演,在讲演中他首次提出了“世界中的中日关系”的新概念。海部说“在我国对世界和平与繁荣将发挥更大作用之际,从全球的观点重新考虑同中国的友好关系至关重要。换言之,我们现在已进入应该从世界范围的观点重新探讨两国

关系的时代。”^③但是,海部在与中国总理李鹏会谈中亦改变了过去在对华政策上的某些做法,首次向中国提出了民主、人权、裁军、环保等地区或全球问题。综合而论,海部提出“世界中的中日关系”新概念,是有双重作用和正负两面影响的,标志着日本对华基本姿态“经济合作、日中友好、政治反省”开始改变,试图加重对华外交的政治色彩;标志着日本大国战略的形成;亦显示出日本限制中国的意图。当然,希望建立超越中日双边关系,立足于亚太甚至世界的中日关系,加强两国在地区及全球问题上的合作,发展更为广泛和更高层次上的关系等,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海部后的日本历届政府基本上也都肯定和继承了“世界中的中日关系”这一对华政策方针。而中国政府虽未直接评价,但亦未表示异议。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日和日本明仁天皇访华为标志,中日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其实质性的进展是中日的双边合作向多边合作发展,逐步形成并确立了“亚太中的中日关系”和“世界中的中日关系”。

1992年4月6日至10日,江泽民总书记访日期间,中日首脑会谈后日方在首相官邸举行盛大宴会,在宴会上江泽民说“我们愿意积极吸收和参考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中国加快经济发展,将会使中日友好关系在更高层次上向纵深发展。”宫泽喜一首相说“今天的日中关系不仅是两国间或地区性的关系,而且已经进入‘世界中的中日关系’的时代”,“希望两国今后在军备控制、裁军、地球环境等问题上加强政策性的对话,建立‘为世界作贡献的日中关系’”。这是中日两国首脑第一次共同提出“世界中的中日关系”这一命题,标志两国“世界中的中日关系”的确立。^④

对“世界中的中日关系”,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是“对世界和平和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中日友好关系”,宫泽首相提出的是“为世界作贡献的日中关系”。不同的话语,讲的都是同样的含义,目标是相同的。即在冷战结束后,中日两国发展稳定和良好的中日关系,是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的重要前提;两国不仅在亚洲,而且在建构和平的

国际环境方面,都有责任和义务;稳定良好的中日关系不仅对两国的和平、繁荣极为重要,而且对亚太地区及世界的和平发展亦是十分重要的,换个角度看,世界潮流和冷战后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均要求两国建立能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的“世界中的中日关系”^⑤。

第三阶段是从2001年至2012年。

这一时期是构筑21世纪初新的中日合作关系的重要时期,也是中日结构性问题凸显的时期。

面向和跨入新世纪,中日关系的世界定位亦日益提升,两国均负有为东亚、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彼此合作的历史使命。然而,由于21世纪初期日本小泉纯一郎首相顽固坚持参拜供奉有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日本政府提升日台关系的地位,在钓鱼岛及东海海洋经济区域划界,在我国开采春晓油田方面不断挑衅,制造事端,加之文部省悍然放行日本右翼教科书和妄图绕开中国硬闯关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等原因,中日关系出现诸多问题,其影响亦波及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及世界,而其责任确实在日本。

在新世纪初期,中日两国在经济合作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势头,连续四年创新高,两国贸易额在2004年达到1680亿美元,2005年则接近2000亿美元,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方面的合作亦迅速向纵深发展,呈现良好势头。

只是由于小泉首相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至2005年10月已是五次“拜鬼”),两国最高层领导人未能实现互访,且让两国国民感情蒙受了不良影响,两国民间均有一些感情用事之事发生。

从过去的历史和未来发展考察,在与国际社会合作方面,中日两国已经做出并在将来更应该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首先,是两国均在东亚地区和国际合作中具有重要而巨大的作用。这些作用,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关键的决定性作用,这种地区大国的作用必然影响世界。1972年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的两国联合声明、1978年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1998年中日两国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三个重要文件已表

明,让意识形态影响国家间的关系是不明智的。企图把一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强加于另一方,甚至为此使用政治、经济压力,则只会恶化两国关系。可以说,没有任何建设性的国家关系能够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世界中的中日关系亦是如此。两国似均有可以自我反省、反思之处。

其次,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中日在东亚及世界国际合作中已呈现许多新景象。一系列构想已经提出:如首先建设东亚自由贸易区,而长期目标则是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报告书已在制订并将呈送新一届10+3非正式首脑会议审议。又如,中、日、韩三国学者近年来每年均定期举行东亚合作问题的研讨和分析,提出实现东亚经济共同体分三步走的分阶段计划,即第一步在10+3框架下进行地区整合与具体合作计划,第二步是东亚大区域的框架整合,第三步是逐步过渡到共同体机制。再如,三国民间学者共同合作编著了《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进而考虑并进行了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官方组织等类似合作,2014年10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古代史卷、近代史卷)中文版,日本的出版社也同时出版了日文版。这些都表明从经济、文化合作可以发展到政治、军事合作、协调;从民间实践可以发展到促进官方的合作发展。这些合作,不仅涉及东亚,更扩大到了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合作。两国在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各自的努力和贡献。

环渤海区域的中日韩经济合作论坛已举办多届,2004年8月在天津召开时,就有三国政界和经济界人士共同探讨国际合作新形式的重要内容。

中日两国领导人在出席各种多边国际会议时保持着接触,会见、谈话涉及国际合作及中日关系几乎成为惯例,亦利用一切多边会议进行合作。只是由于小泉首相于2005年10月悍然第5次参拜靖国神社,才导致多边会议中双边的会见中止。

2004年1月,北京举行了“亚太议会论坛”第十二届年会。11月,中日领导人又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领袖非正式峰会,胡锦涛总书记在圣地亚哥会见了小泉纯一郎。

2004年10月召开的以“友好互信,合作共赢:构筑东亚安全新秩序”为题的首届中日韩和平发展与安全保障高层研讨会,涉及军事安全、外交战略及媒体作用等广泛内容。

最后,中日两国还与国际社会合作,为建立世界新秩序发挥作用。中日两国同心协力,为解决冷战遗留的种种问题和协商解决面对新世纪的种种问题,作出了各自的努力和贡献。

21世纪初期,新一届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成立并召开了第一、第二次会议。两次会议均结合当前中日关系形势,研讨和交换了对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意见。中日政府间的两国战略对话也已进行了四轮。只有从长远角度、战略高度考虑和发展中日关系,才有出路,才有各自的尊严、利益和安全,才有地区乃至世界的共同利益,才能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共同作出贡献。

当前“世界中的中日关系”及对未来的展望

从2012年安倍第二次上台开始,他本人及其内阁们的错误言行,不断激起中、朝、韩等国的愤慨和批判,其历史认识和历史观亦令曾遭日本侵略的国家、人民忧心不已。

这里仅简略列举如下:(1)安倍在2012年10月竞选时,公然表示2006~2007年任首相时“不得不放弃参拜靖国神社,这让我一直悔恨不已”。果然,他再次上台的第二年4月,就怂恿副首相麻生太郎等多名阁僚率上百名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他自己也向神社献上了祭物。5月,到缅甸访问时,他专门去参拜侵略缅甸的日军墓地;2013年8月15日,又有多名安倍内阁的大臣和百余名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安倍还特意送上了“祭祀费”。(2)他提出了“侵略定义未定论”。(3)他公然声称“自己是宪法的修改论者”,把修改宪法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他身穿96号运动上衣,以显示修改和平宪法96条的改宪第一步的决心,声称,“日本修改和平宪法,不需要向邻国解释”,进而在7月中旬公开提出了要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更有其得力心腹副首相麻生太郎,竟然在7月公开讲话中引用德国纳粹政权修改宪法的例子,说什么,“我们可以学习德国魏玛宪法在不知

不觉中就发生变化的这种方式”。(4)他冒天下之大不韪,登坐731号战斗教练机,向人性、人道、人权公然挑衅。(5)8月15日,他率阁僚参加第68次“终战纪念日”,发表为历史翻案的讲话,并当面三呼“天皇陛下万岁”。(6)安倍政府扬言要“修正”“村山谈话”和“河野谈话”。(7)安倍公然在12月26日参拜靖国神社。(8)安倍加紧解禁日本“集体自卫权”的行动,于2015年获通过,并且于2016年3月29日正式实施,即能行使“集体自卫权”。(9)在2015年,不顾国民反对,通过新安保法案,强化日美同盟,充当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马前卒。(10)搅局中国南海问题,借菲律宾关于南海的所谓“仲裁案”闹剧,打压中国。(11)拼凑新的澳印圈,围堵中国,等等。

安倍2012年年底上台后,一反第一次当首相的做法,很快抛出了所谓“战略外交”“价值观外交”和“积极主动外交”三原则。安倍的外交三原则不外乎是重弹冷战思维的老调,打意识形态之牌。再次上台后,安倍多次极力表白:日本将大力巩固和加强日美同盟。2013年2月访美后,他明确表示普天间机场(驻日美军基地)将在县内搬迁,并会积极参加“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更在2013年底给美国送上“大礼包”——普天间基地在县内搬迁。安倍还频繁展开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图谋构筑“制华包围圈”。安倍及其阁僚几乎访遍东南亚各国和澳大利亚,试图打造所谓的“安全保障菱形圈”,强化与菲律宾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他走访了中国周边30多个国家;又前后邀请印度、缅甸等10多个国家领导人访日,还特别安排了11月30日的天皇夫妇对印度的访问。安倍政府在突出经贸的同时,也在经济上通过减免债务、增加援助、增加投资等“甜头”,挤压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和空间;更在政治、安全方面下力气,政治上联合菲律宾、越南、印度等同中国有领海或领土之争的国家,博取同情和支持,打造其“统一战线”。安倍不惜大把撒钱,大造声势,表面上看似乎一时也取得了一定效果,最终一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尤其不能不令人警觉的是,安倍上台后,极力

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制定扩军计划,加速扩军步伐。他大量扩充军备,增加防卫预算和人员编制,购买、研究发展和建造最先进的军机、军舰,积极谋划改自卫队为国防军,全面、整体推进日本的军事力量。在2013年7月的国会讲话中,安倍强调全面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必要性,并积极推进实际解禁。更有甚者,在11月26日众议院通过后,于2013年12月6日深夜,安倍的自民党和联合执政的公明党,不顾在野党和国民的强烈反对,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强行通过了《特定秘密保护法案》(“密保法”)。而在2013年12月4日,安倍已启动了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国安会”)。“密保法”与“国安会”的结合,使首相和首相官邸有了极大的权限,也使日本政府的最终决策更易于倾向军事手段,从而增加了“以军治国”“以军立国”的危险性。安倍内阁17日通过了首个外交与安全政策综合方针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未来十年防卫力建设方针的《防卫计划大纲》。2014年防卫预算拟定为4.88万亿日元,之后又连续两年增加军费,而且毫不隐讳地将其矛头指向中国、朝鲜。

安倍的所言所为,从国际大环境看,是为追随和充当美国“亚太再平衡”的马前卒,是遏制中国发展势头的极端表现;从国内看,是日本新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泛滥的必然结果及维持自民党长期执政的政治需要,也是日本强军,走向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必然反映,特别是日本右倾化社会思潮的结果。尽管东南亚个别国家因觊觎中国南海的一些岛屿和开采石油之便,暂时会与日本沆瀣一气,但从大局看,大多数东南亚国家还是认同在《南海共同宣言》的框架下通过双边协商解决分歧,而且没有一个国家公开支持日本对钓鱼岛拥有主权。更重要的是,当今的中国,经济、军力、国力与以往已不可同日而语,世界的繁荣与稳定也离不开中国。

海峡两岸的关系在马英九时期是60多年来最好的时期,19项协定和习总书记、吴伯雄荣誉主席的会谈,更标志两岸关系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政治对话的“破冰”,使创造更多的合作红利正当其时。然

而,蔡英文上台后,大搞台湾独立,死不承认“九二共识”,使两岸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形势极其严峻。中美习奥会的积极成果曾经令世人瞩目: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美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已经达成共识,中美将保持强有力的合作关系;特朗普上台近两年来,形势复杂多变,刚刚宣布不打贸易战(有太多的经验教训),又在台湾军售、台海关系等问题上突破中国的底线,更反“言必信行必果”的承诺而行之,毫无信义可言,“翻脸比翻书还快”;日本也不断在台湾问题上,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不断升级日本和台湾的关系,向半官方,甚至实际上的官方关系迅速发展,挑战中国。

我们认为:中日关系的前景从长远看仍然是谨慎乐观的。中日两国永远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潮流之中,只要我国持续发展,实力不断增强,虽然中日间将长期存在矛盾、摩擦、竞争,甚至对抗,但尚不至于出现最严重的局面,中日关系仍会长期、稳定地向前发展。中日关系的发展,只有遵循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正视历史、面向未来,才能不断巩固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从而推动政治军事、经济贸易、文化科技关系的全面发展。而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又更要求夯实政治基础。这种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的良性发展是具有战略性的。中日两国是永远搬不走的邻居,钓鱼岛问题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当今时代,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依然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安倍政府逆流而动,绝没有好结果;只有改弦易辙,修补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才是明智的。

为防止中日关系出现停滞和倒退,中日双方一定要积极进行对话,加强沟通,尤其是高层政要,只有顺应时代潮流,勇于突破,才能重开新局面,出现改善和发展的良好新局面。两国要以民间交流为基础,以两国领导人决策为关键,这是决定中日关系发展的枢纽。最近中日韩领导人在日本的会面及李克强总理成功访问日本,标志着中日关系的转暖、向好。来之不易,值得珍惜。

对全球视野下中日关系的五点认识和思考

面向未来,既要清醒、理智,又要面对现实,未雨绸缪。

有鉴上述,笔者提出以下五点不甚成熟的认识,既有对中日关系所存问题的认识、解决方法和对保证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的建议,亦有对未来“世界中的中日关系”发展前景的展望。

第一点,对中国而言,究竟应如何看待当前世界和中国、中日关系形势?窃以为,既要力避两个极端,又要正视现实,特别是从防范方面考虑。

认清世界潮流和时代主题没有根本转变,但也是世界共运、社会主义运动受挫,处于低潮的历史时期。所以,依然是机遇和挑战并存:既是中国走向复兴、富强的的大好时代,又是中国备受围堵、遏制、打压和被妖魔化、抹黑、唱衰的艰难时期;既是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又是充满危机、挑战的困难时期。中日关系也是既有合作共赢,又充满矛盾博弈;认清国际与国内形势,应该既坚持四个自信,又保持和增强危机意识;认清中国相当一段时期是处于三个被“绑架”状态:金融被美国,外交被周边,舆论被网媒,虽然经过努力已有向好发展趋势和一定的转变,也亟待解决;认清世界大势:美国并未完全走出危局,欧洲仍处于困局,中东依然呈现乱局,东亚则凸显变局。这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大背景和出发点,也是准确定位中国、中日关系的重要依据。

第二点,中日关系的结构性三大矛盾(日本窃取我国领土钓鱼岛争端,日本不能正确认识、对待侵略历史问题和不断突破与中国台湾民间关系的承诺)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和彻底解决,我们要将中日关系放在更长时段,即放到21世纪后半叶甚至22、23世纪进行审视。我们只能根据地缘政治学、经济学和文化方面的久远关系处理两国关系。中日两国是邻居,至少应该做相安无事及和平共处的邻居,争取做好邻居,长期友好合作。中日两国在经济全球化时期只能是多元共存,不仅有观念、认识的问题,也有现实、利益的问题。“机遇和挑战并存”“斗而不破”将是可预见的

196

现实和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的基本状态。两强并立于东亚,必有矛盾、摩擦、竞争、斗争和对抗,甚至会有局部的冲突,但总会有战略的、根本的、长远的全局利益来抑制和制约中日两国关系的失控,中日两国将长期在崎岖、坎坷的道路上曲折地向前发展,中日关系是一种必然会有矛盾、又相互依存之关系。安倍2012年上台伊始,就用悍然参拜供奉有日本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关闭了中日高层交往的大门,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物。现在,安倍为摆脱国内丑闻困境,服务选举,打出“三步走”计划,已开始进行。李克强总理访问日本标志中日关系开始转暖。但是,安倍实用主义的目的十分明显,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冷静。而在增强互信、互惠,构筑中日战略关系问题上,又是双方都有需求,可以合作共赢的,我们应该,也一直在作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第三点,中美日三角应该总体动态把握。我们也应该更进一步深入地思考:当今的美国、日本,是上升、攻势为主导,还是衰退、守势为主导?美国基本放弃“亚太再平衡”后,特朗普要收缩战线,使美国更加富强,推行“美国第一”战略和“美国优先”策略,不惜“川(有将特朗普翻译为川普者)剧变脸”;日本的所谓正常“普通国家”诉求不可化解而只能引发对抗、冲突?如何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如何建立东亚中日两强并立、和平互利的关系,考验着中、美、日三国,更需要中日两国的努力和聪明智慧。加强各层次广泛的沟通和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加深相互的准确认识,特别是民间的广泛、深入的友好交流,“以民促官”“以经促政”和“以文促情”的传统及经验,正可大显身手。还有保持中日两国间高层不拘形式的接触,利用多边会见促进双边关系的改善和稳定发展。这主要取决于安倍及今后日本政府领导人的言行。而中日双方的传媒,应如实反映和注意正面报道两国的真实情况,减少甚至消灭情绪化的、不负责任地恶意歪曲报道对方的负面信息,传达负责任的、有利于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的信息,以免误导民众情绪。还想再次强调指出:首脑外交是关键、首位的。

第四点,中日双方要恪守中日间的四个政治

文件,而决不允许大幅度倒退。两国均应强化世界意识、经济国际化意识,以国际规则、公认的国际法为依据,不应只强调自己国家的某些习惯而违背国际法,更应摒弃“双重标准”。这方面,日本问题很多,应更加注意和改进。

在中日三大原则分歧问题上,只要涉及我国核心利益、国家安全和尊严,就绝不能作无原则妥协,但也要注意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一定要建立危机掌控、管理机制。

首先是妥善处理历史认识问题、遗留问题。这一问题主要出在日本方面,应该拿出诚意,以实际行动来解决问题。中国方面亦要更有耐心和有长期斗争仍颇难彻底解决的思想及精神准备。解决这一问题应放在中日关系总的长远战略利益和关系方面来考虑。当然,同样亦有正确、错误,正义、反动的是非问题,也要遵循国际准则这一共同的标准。其次是日本应该遵守承诺,停止将与中国台湾的关系向准官方、半官方、官方推进的冒险做法;再次是两国共同努力推动中日韩、东亚及亚太经济贸易等各方面的区域合作,共同维护东亚、亚太和平;顺应和平发展的国际潮流,应时代之要求而相互协调,倡导和加强国际合作,致力于亚洲的繁荣、振兴,致力于世界的稳定、和平与发展,推进世界中的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未来“世界中的中日关系”,其追求的只能是、仍会是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而只有稳定健康的中日关系才能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倘能如此,也才不愧称为世界中的中日关系。

第五点,中日关系的根本保证、关键的关键,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可持续发展,增强国力,真正富起来、强起来,从容应对东亚和世界风云变幻。一定要采取有效举措,确实避免和有效化解当前发展可能遇到的四大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和西方分化陷阱),抓住机遇,排除干扰,迎接挑战。我国学人一定要从战略高度为国家的对日工作,提出可供参考、借鉴的建设性意见和可行性建议;让我们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善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全球合作理念与实践而努力,使中国重振辉煌,早日建成国富民强的真正的世界大国、强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

①《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8~449页。

②《周恩来外长关于美国及其仆从国家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的声明》,载《国际条约集》(1950~1952),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387~389页。

③参见刘江永主编《跨世纪的日本》,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466~467页。

④⑤参见吴学文、林连德、徐之先《当代中日关系》,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249~250页。

作者简介:汤重南,1940年生,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潘清)